

学术传承与拓新

——林家有教授治史 50 周年纪念文集

陈金龙 赵立彬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学术传承与拓新 ——林家有教授治史 50 周年纪念文集

陈金龙 赵立彬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传承与拓新——林家有教授治史 50 周年纪念文集/陈金龙,赵立彬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9
ISBN 978-7-5068-5840-3

I. ①学… II. ①陈… ②赵…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192 号

学术传承与拓新——林家有教授治史 50 周年纪念文集

陈金龙 赵立彬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文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840-3

定 价 59.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林家有教授



林家有教授与夫人

对孙中山研究的践行和新思考 (代序)

林家有

[编者按] 林家有教授一生致力于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长期担任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和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对于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和近现代史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16年适值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山大学历史系专门进行了对林家有教授的学术访谈。采访工作由林家有教授的弟子、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赵立彬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广东警官学院讲师伏传伟进行,访问稿经林家有教授审阅,首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3期。(文中■为访问者赵立彬、伏传伟,●为林家有教授)

一、走上孙中山研究之路

■: 林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这次专访。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您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几年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孙中山研究新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有现实感、时代感和立体感的孙中山。我们知道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后来是如何回到中山大学,专门从事孙中山研究的?

●: 我1963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史研究,并参加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工作。我从研究少数民族史转到研究孙中山,这里面有很多机缘巧合。

对孙中山研究的践行和新思考
(代序)

1976年，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患重病，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杨荣国和社科院侯外庐先生很熟，一起编过《中国思想史》，我和侯外庐先生的弟子黄宣民（黄是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师兄）等几个同学一起去协和医院看望他。他告诉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他主编中国通史，具体编写工作由金应熙教授主持，但人手不足，黄师兄就推着我，这样我就从北京中国社科院调到广州，来协助金应熙先生编《简明中国通史》。当时编《简明中国通史》分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编书的地点是在黄华路省委党校，近代史组有我，还有中大历史系的骆宝善老师和段云章，省社科院的张磊、黄彦、方志钦、张难生等，还有三个工农兵学员和一个部队的政委。这个工作做了两三年，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

我转向孙中山研究，和中大历史系陈锡祺先生的指点与提携是分不开的。陈锡祺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博古通今，爱国情盛，他认为在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山大学研究孙中山是应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陈先生即着手研究孙中山。70年代初期，陈先生着手在中山大学恢复孙中山纪念馆，带一批老师到北京搜集材料，我当时和他们有较多联系。编完《简明中国通史》后，陈锡祺先生和陈胜彝教授把我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正好陈锡祺先生要成立孙中山研究室，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孙中山研究室，他担任研究室主任，就让我当秘书，孙中山研究室后来改名，就是现在的孙中山研究所。

很凑巧，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联系中大历史系共同编撰辛亥革命史，他要找一个能写少数民族史的人，就找到了我。我和章开沅先生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他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也在这个编辑部，胡守为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章先生，后来他们都回了各自的大学，我也到中大历史系来了。这样，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后，由编撰辛亥革命史开始，我的研究也转到了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少数民族历史，这就和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研究联系上了，随后就走上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道路。章开沅先生常说“是我把林家有拉上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道路的”，这一点不假。

二、孙中山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

■：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各个时期得到了政治上的肯定，成为一面政治上的旗帜。有许多人认为，研究孙中山就是为政治做注脚，就是神话政治人物。您能否向我们谈一下，孙中山研究有何学术价值？同时又如何从学术价值中体现现实关怀？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的伟大人物，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不仅为中国开辟历史新纪元，也为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民主革命开创先例。这一点是共识，也是大家一致承认的。

伟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研究孙中山，彰显其历史功绩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孙中山，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是中国先进人物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觉醒、民族实体形成和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历史。从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黄兴，有传统的士大夫，有改良派，有革命者，但他们都是为中国摆脱奴役和压迫、实现民族自立和富强而奋斗的先进人物，孙中山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关系非常密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影响深远，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妇孺皆知。“三民主义”思想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孙中山既不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完全西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集合中外的精神，防止一切的流弊”，进行了不倦的开拓性探索、吸收和融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其他思想，比如他的宗教人性观、他的道德观、他的大同理想和社会新秩序的构想等，都是中西文化精华的结晶，不但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的宝库，还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确立了努力的方向。孙中山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和民族自觉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再到戊戌维新运动后的“立宪救国”，最后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的汹涌澎湃，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持续变革而相继出现，是值得我们放在大时代背景中深入研究的。

孙中山研究的现实意义也非常明显。当代中国最重大的问题，无非是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他在《实业计划》中，第一、二、三、四计划都是规划和发展中国的交通，提出要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建设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整治长江、改良珠江水路系统等等，都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方面做过或正在做的事情。孙中山早就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问题，认为忽视生态环境建设，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会对当代和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这些主张和意见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经济和自然条件，对中国实业发展做的具体的规划，也是他长期探索的成果。

孙中山的社会建设思想也很有现实意义。孙中山认识到拯救中国、复兴中华是一项世纪工程，有政治问题，有经济问题，也有思想文化问题。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发展政治文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实现民族独立、社会民主和国家富强，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实现“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这就关系到世道人心、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等诸多问题。所以，孙中山一再强调，只有物质文明不行，还必须实现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使国民具有高尚的人格、道德以及高深的学问，做到“无民非士，无士非民”，中国就一定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反观现实，这些正是我们当下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也可以提供借鉴。我先举一个例子，1979年11月，经过陈锡祺教授的积极筹备，中山大学与辛亥革命研究会、广东历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是“文革”后第一个以孙中山为主题，且有美、日学者参加的盛会，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学术界的第一声。中山大学作为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大学，积极与海外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大学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共同的话题就落在孙中山研究上，境外学者也通过接触中国的孙中山研究者，开始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孙中山研究是我们海峡两岸和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共同话题，是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我们研究孙中山，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在“造神”，孙中山的言行和思想、精神

对当今中国的发展、进步有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国家领导人也都重视孙中山研究，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孙中山研究不但在中国是显学，世界上很多学者都重视孙中山研究。所以，孙中山研究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研究孙中山是学术的需要，也是为了总结和弘扬孙中山的精神，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三、孙中山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孙中山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您担任过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所长，对国内外的孙中山研究情况非常熟悉。请问您，孙中山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有哪些独到之处？您是如何开展这样的研究的？

●：孙中山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曾有学者问过我，孙中山是不是差不多已经研究完了？可以结束了？我的回答是：还差得远。那究竟研究什么呢？这就是你刚才问题所说的视野问题、思维方式和方法问题。

所谓视野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和范围，视角偏狭只能看其一点，结论往往片面；视角宽广，既注意点，又注意面，就会避免很多片面性。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有价值，对旧材料进行再研究，用新的视角进行新的阐发和再发现，一样有价值。过去，许多国民党的理论家、学者，还有外国的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从不同的方面解释孙中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基础，但的确也存在许多局限，比如讲来讲去离不开“革命”二字，重点研究他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又为了研究革命而研究他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研究了这么多年，如果单纯从“革命”的角度进行重复的研究，的确没有太多东西可研究了。

上个世纪末，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在书中，我提出：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振兴中华，追索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我把“革命”和“现代化”结合起来，逐渐把研究孙中山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思想作为重点。当时的社科重点课题很少，能够立项，说明这个转变是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出来后，广东教育出版社相当重

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把这本书印刷得非常精美，还给了很高的稿酬。学界和文化界反响很大，国内外媒体、《人民日报》、台湾、广东的很多报刊发了不少评论，后来还获得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全国优秀图书奖。通过这样的视角转变，极大地拓宽了孙中山研究的领域，我的孙中山研究也由“革命模式”向“现代化模式”转变。这个转变不是否定孙中山的革命，而是用新的思维去解读孙中山，说明孙中山革命是为了建设，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社会的文明进步。此后十多年，我基本上都在研究孙中山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城市建设、乡村建设以及国防建设，出版了好几本著作。所以，只要转变研究的视角，孙中山研究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去做了，一些旧的课题也有深化和细化的可能。

比如革命与改良问题。我不反对革命。近代中国不革命怎么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近代化，首先要革命。但传统观点认为改良都是错的，革命都是对的，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近代中国很多该肯定的都否定掉了。如果换个思维角度，用近代化的理论来分析，其实很多都是该肯定的。洋务派要肯定，立宪派搞民主政治也要肯定，近代中国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都该肯定。顺着这个思路，我开始从事新的研究。

比如关于孙中山思想核心的问题，众说纷纭。我认为爱国、革命、建设都是他的核心思想，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爱国。孙中山原本做医生，从他个人讲，做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很好，何必要革命呢？因为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所以，他要从“医人”转到“医国”。但革命只是破坏，打倒旧的东西，还要建设。所以说孙中山的核心思想是爱国、革命和建设的统一，他的目的是要独立、民主、富强，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

比如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从事了十多年的少数民族史研究，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研究民族问题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我并不局限于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理论本身，而是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与世界和平的问题，研究民族国家建立的问题。我在1998年写过一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发表在当年《文史哲》上。我认为孙中山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带有国际主义倾向；孙中山反对列

强侵略，但又带有和平主义倾向，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大同和“天下为公”。所以，他坚持对友好邻邦“益增睦谊”的原则，主张扶持弱小民族，抵抗世界列强；他强调用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推动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研究视角转换以后，就比单纯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更有深度。

我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出版以后，仍然不断写一些文章，都是研究视角转换以后在研究孙中山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后来《政治·教育·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一书，写作的视角也比传统写法有所创新，我把政治与教育的发展及社会的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关于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也是在这个思路下进行的。

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每个人做学问都有自己的方法，按照某种所谓方法的教条去实践，未必就成功。大陆学者过去受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的影响，一段时期内研究孙中山不是为了学术，而是在争话语权，即谁是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又由于受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影响，写起来都是从头到尾，堆砌材料，枯燥烦闷，使人不忍卒读。还有重理论，轻视史实，容易空论和教条。研究历史要理论与史料相结合，采取边叙边议的办法比较好。可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叙先要熟悉史料，并能前后贯通，否则叙不好；要议就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有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有综合思考的能力，否则就议不好。如何收集史料，如何排比材料、如何考证材料，都不太困难，难的是思想的深度，判断准确，评议到位，文字简练，分析有新意。什么以史代论，或以论带史的方法都容易走极端，要么是堆砌材料，没有分析和议论；要么是空论，没有史实作根据。这里可以推荐大家读两本书，一是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屡经挫折的爱国者孙中山》，全书的结论和议论文字都很有新意，对于我们会有启迪；一是以色列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上下卷，对于思维的拓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会有很大帮助。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方法问题，我还想再强调两点：一是学会对文献和资料进行考证，二是写作是给读者看的，行文要流畅，结论要明确，征文材料要规范。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现在很多人对孙中山有不负责任的评价，不仅年轻学者，有些所谓资深学者也是这样，说什么辛亥革命不该发生，让清政府实行自我改革中国会发展得更好；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贡献比孙中山大；否定“二次革命”，说孙中山的护法违法，更有甚者说孙中山开创了中国一党独裁的先例。这些言论都是情绪化的宣泄，经不起事实的辩驳。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对历史负责，不能抱着个人的情绪和其他目的。我们不能神话孙中山，更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客观的评价。

四、孙中山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研究现在成果非常多，起点非常高，年轻学者经常有望而却步的感慨。作为一位前辈，您认为以后孙中山研究应如何继承和发展？有哪些领域值得开展重点研究？能不能给年轻学者一些启发？

●：要从学术的角度，做一些在学术上有贡献、有进展的课题；同时，要为国家统一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服务。基于这两个考虑，我认为，首先要考虑过去孙中山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点。比如晚年孙中山联俄联共对国民革命和北伐统一中国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局限性；再比如民国初年孙中山对革命派、立宪派、知识界，以及商界、原清政府的大臣、总督巡抚、各级官员的看法，政策上有无失误，中国的旧势力旧文化对孙中山的制约。我认为以下几个领域值得着手重点研究：

1. “孙学”的定位和内涵问题

“孙学”一词在台湾已流行了数十年，其内涵包括孙中山的思想、事功、孙中山与他的团体、各界人物，以及孙中山的精神和思想遗产等。大陆学术界迄今尚未流行“孙学”一词，一般习惯称为孙中山研究。“孙学”的内涵是根据我们对孙中山的历史定位而定的，孙中山的思想博大恢宏，包罗诸多学科领域，影响又远远超过他所处的国界与时代，自然可以称为“孙学”。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建立“孙学”研究体系、明确“孙学”内涵，以及建立“孙学”研究基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孙中山思想的渊源与知识结构问题

孙中山思想的渊源与知识结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政纲、五权宪法理论，他自己说有传统的，有西方的，也有他独创的，但真正来源于何方、何人，搞不清楚；他说他喜欢读书，他到底读了一些什么书？早期读过什么书？后期撰写《建国方略》时又读一些什么书？晚年有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的革命建国、振兴中华的思想又是如何形成、受到国内外什么启示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这都是重大的课题。

3. 孙中山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问题

在民族团结方面，孙中山的一些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民族团结问题还是困扰当下中国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孙中山本来想修铁路，他设计有五大铁路系统，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维护民族团结。孙中山1919年宣布废除五族共和，为什么要废除？他说我们国家何止五族？晚年他提倡大民族，把各民族熔于一炉，美国就是这样。孙中山主张大中华共和，他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统一方面的主张是值得研究的。

4. 孙中山的人学思想

孙中山从自身革命经历和感受出发，结合中国国情，按照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的差异，将人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并赋予不同的人在社会进化、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同的行为特征和角色意义。他认为个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的使命与角色，这一认识贯穿和影响了他的有关人与社会、人与革命及建设关系的持续思索，成为其构建宪政思想中权能分离理论的基础依据，对国民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将这种划分放置到孙中山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其意义还可以互相发明。如与教育思想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恰好说明孙中山从人本身的天资和受教育的程度去衡量人的作用和价值，说明人受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凸显这三类人的划分并非僵化封闭的，而是变动不居的，“不知不觉”者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实现向“后知后觉”的流动。孙中山对这三类人的划分，长期以来在内地学界遭到批

评，现在有必要深入研究，重新认识。

5. 孙中山人际关系的研究

孙中山的人际关系研究，我认为是薄弱点，这个方面的材料非常多。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包括华侨华人也有很高的认同，接触的人很多。有的成为他的支持者，有的成为反对者，有的开始支持他，后来又反对他。孙中山与各类人物的人际关系，包括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与知识分子，与维新派、立宪派、国民党老同志、日本友人，课题成千上万。现在在海外华侨社团中还发现了好多新材料，都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6. 孙中山建国思想与强国梦的研究

孙中山复兴中华的步骤分为三步，开始是从事革命救国；辛亥后转为实业救国，复兴经济；晚年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孙中山重实际，不尚空谈，对理想执着追求。孙中山在一个世纪前陈述的许多观点、看法，对今天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他的精神不会随时光的消逝而远去，也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辉。他在《建国方略》中，希望构建一个文明、和谐、富裕安康、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美好社会，他所确立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是对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继承，又包含有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子，是一个综合古今中外思想精华而创获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

7. 孙氏家族和宋氏家族研究的问题

孙中山的父辈、长兄孙眉、夫人卢慕贞、宋庆龄、儿女孙科、孙婉及其后代，都值得研究。孙氏家族与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不是为了研究家族而研究家族，而是为了研究孙中山成长的经历和环境、孙中山的思想的影响。研究孙中山必须研究宋庆龄和宋氏家族，道理是同样的。

8. 孙中山研究的资料整理和发掘

这些工作主要包括：首先要将各种中外文报刊刊载孙中山活动的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版，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常见的报刊资料，要注意收集整理；其次是过去全国各地都出版过有关人物对孙中山的回忆材料，应予再版；再次是华侨与孙中山关系的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地，应予搜集。上海孙中山故居藏有孙中山使用或珍藏的5 000多册图书，有不少外文书对孙中山思想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应挑选其中重要者，翻译出版。

五、如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据说今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山市政府将联合举行“国际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林教授对此议题有何看法？

●：孙中山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尊敬的杰出政治家，也是开辟和建构中国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思想家。他不仅用毕生的精力守护和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团结、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国家无私奉献自己的智慧，获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永恒的纪念。当今的世界非常复杂，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希望中国崛起受挫，更希望中国分裂，回到殖民时代，由列强欺凌、摆布、指使和统治，这是白日做梦，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孙中山说得好：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多难可以兴邦”。我们为了应付世界的复杂形势，应当学习孙中山“恢复民族精神”，建设强盛的国家，弘扬和继承孙中山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遗产，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说他“忧国之责，未敢稍懈”、“忧国之责，义不敢懈”。他强调民族分裂必然导致国家灭亡，“故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救世、救人、救国，靠的都是民族的团结、民族的凝聚力。何谓团结？团结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万众一心，为着一个目标去奋斗。何谓凝聚力？凝聚力就是强国的黏合力、骨肉同胞的亲合力、汇聚力，也是

民族的坚强意志和不可分割的震撼力。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凝聚起来的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国有力量的表现。各族人民不仅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亲密无间的黏合力和不可动摇的团结力，还有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以及热爱和平、“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的形成，是人们觉醒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前提。没有民族的觉醒就不会有民族的真正强大的凝聚力，而没有凝聚力的民族就不是优秀的民族。孙中山着力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在他鼓舞和提倡下，“中华民族”成为代表中国各民族的国族，并随着国族意识的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不断加强。所以，孙中山强调，中华民族有无力量、它的凝聚力的大小、强弱，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统一富强。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强调我们必须重视民族精神的研究，要用正确的态度去总结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加速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只有这样才会有自觉凝聚力的产生，也只有这样形成的凝聚力才会坚固。而要加速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孙中山说，就必须对全体国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中华民族意识，使全体国民树立起强烈的强国精神，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认同感。孙中山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源泉，各民族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文化的自觉认同才会有人心的统一。中华民族由自觉而自信，由自信而自豪，都是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形成国族主义精神的呈现。自觉是人心的统一，自信与自豪是力量的根源。孙中山重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强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目的是为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是为了建构新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可见，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凝聚力的问题，是国家政治建设中的新议题。当今的世界虽然已经不是孙中山生活时代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但是某些发达国家妄图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图谋依然存在，它们煽动民族分裂，希望中华民族复兴受挫。这是力量的较量，也是智慧和民心的检验。所以，强调民族精神的复兴和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仍是一项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只有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增强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合力共建一个文明、共和、民主、

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才会有复兴和强盛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习孙中山发扬民族精神，自觉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系，奋发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民族才能朝气蓬勃地迎接美好的未来，实现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2016年是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11月12日至15日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山市政府将联合举行“国际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主题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弘扬孙中山的精神，继承他的事业，就是要坚持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强国理想，坚持复兴中华的中国梦，毫不动摇地守护和捍卫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是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发达的根本保证。只要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形成多元一体的坚强的命运共同体，就会发挥巨大的正能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复兴中华的伟大理想。

六、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传统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很大影响和声誉的孙中山研究学术中心，您亲身经历了该研究所从创立到发展壮大的历程，能否谈谈您作为一位学术组织者的体会？

●：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创办的，中大人对孙中山先生有很深的感情，很尊敬他。中山大学好几任校长，像黄焕秋校长、曾汉民校长都讲过，中山大学当然要研究孙中山，要担当起研究孙中山的主要责任。

当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创建，陈锡祺老先生是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我们的领路人，是我们的导师。20世纪50年代初，陈锡祺先生在中大最早进行孙中山研究，60年代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点建立。1978年后，我和李吉奎等相继转入并加强这个阵地。后来在陈胜彝教授等的配合下，相继培养了周兴樑、邱捷、陈剑安、桑兵、乐正、贺跃夫等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再后来，陈锡祺先生的弟子们又不断培养研究生，终于形成一支较完整的研究梯队。

陈先生很有学术眼光和组织才能。陈先生告诉我们，研究孙中山，要先搞材料、编全集、编年谱长编，我们就散开到全国各地，我和邱捷